

宋
词
诗化现象探讨

刘华民 著

虞山人文研究

主编 丁晓原 张幼良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宋
词
诗化现象探讨

刘华民 著

虞山人文研究

主编 丁晓原 张幼良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书 名 宋词诗化现象探讨
作 者 刘华民
责任编辑 吴文昊
装帧设计 许 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电话 025-83657300)
厂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C座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4576-4
定 价 28.00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虞山人文研究丛书》总序

张幼良

虞山，位于江苏省常熟市境内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其得名源于商末周太王古公亶父之子虞仲。虞仲即仲雍，为了让位给季历的儿子昌，与其兄泰伯一起避走无锡、常熟一带，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了南方，建立了勾吴政权，使长江三角洲最先见到了文明的曙光。这一带有传奇色彩的佳话传诵至今，昭示了虞山人文历史尤其是虞山文明与中原文化的渊源关系。不过，据现有的考古材料证实，远在泰伯、仲雍到来之前，大约距今 5 000 年前，吴地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至商周之际，又出现了文化复兴的景象。究其原因，吴地文化的复兴乃在于吴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先民的辛勤劳作，尤其是文化智者的开放心态与吐故纳新的文化传承和创造能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吴公子季札的出访中原问礼及虞山民间学者言偃的北上泗水问学。作为孔子唯一的一位南方弟子，言偃把礼乐治国的要义发扬光大，“文开吴会”、“道启东南”，并以其文化智者的崇高形象，给虞山文化的建构亮出了最初的底色，确立了作为常熟文化最鲜明最具特征性的精神内核，这便是诗礼传家，崇文尚教的文化传统。

经过一千余年的文化播种，萌蘖和发展，至中古时期，迎来了更为光辉灿烂的时代。梁昭明太子萧统于虞山东麓筑台读书，引领常熟人嗜好读书的风尚。自隋唐科考以来，常熟一邑出现了 8 位状元，8 位宰相和 483 位进士，而两代帝师翁同龢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自北宋郑时首开藏书传统以来，常熟地区的刻书、印书、藏书文化蔚为大观。至明清时期成为中国私家藏书的中心，如赵氏的脉望馆，毛氏的汲古阁，钱氏的绉云楼，瞿氏的铁琴铜剑楼均名扬海内外；自元代创立第一所书院以来，常熟地区有书院 14 所，形成了县学、书院、社学、私塾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良好的教育制度和师承学统让虞山文化既如七弦琴川，绵延不绝，又如剑门奇石，这边独好，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上最具区

域表征,最为独特、最有影响力的文化灯塔。在中国文化史上,导源于黄公望,以王翬为代表的“虞山画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以严澂代表的“虞山琴派”、以张旭为代表的“虞山书派”,以林皋为代表的“虞山印派”都是源自虞山,以虞山为名,在艺术上戛戛独造,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化流派。

近代以来,虞山文化在传承变革创新中不断发展,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无限生机,作为中国区域文化的代表,虞山文化诸流派代有传人,名家辈出。1986年常熟被列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全国第一座加冕此称号的县级城市。在经济持续发展,声名鹊起的同时,文化发展亦高歌猛进,成为全国闻名的“古琴之乡”、“书画之乡”、“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作家之乡”、“教授之乡”、“院士之乡”。常熟虞山,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生生不息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文化创造的意象。

常熟理工学院坐落于人文荟萃的虞山脚下,虞山文化诗礼传家、崇文尚教的传统和创新求变、与时俱进的人文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理工学人。明末龚立本撰修的《常熟县志·风俗志》说到常熟学人具有“贫不负诺,富不易交,吐纳风流,意气横溢。表人胜士,千里命驾者比比,人物显晦殊途,或矜名节,或树勋庸,或敦学术”的特点,揭示了常熟学人一贯的文化追求和人格精神。作为新一代人文学者的我们,既要受容古代文化的甘霖,在守望传统的过程中自觉接受深厚博大的虞山文化的滋养;又要担当文化建构责任,在开辟新境的过程中主动会通中外文化遗产的精髓。只有这样才能在承续虞山文化的同时找到自身的文化定位和文化价值。

深受虞山文化浸润和虞山学风洗礼的当代理工学人,在与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发展中获得了不竭的创作灵感和源泉,在传承虞山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的同时,更在意于创造带有虞山人文标记的当代文化和当代学术,形成了一批批学术探索和研究的成果。早在十年前由丁晓原教授主编的《虞山学术丛书》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十年后我们仍将承继过往,以“虞山人文研究”为总题,每辑遴选一批优秀成果结集出版,集中展现近十年来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和苏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最新成果,以期为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地方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院长
苏南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张幼良
2014年6月于东湖观澜轩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议论现象	16
第二章 叙事现象	38
第三章 小序现象	58
第四章 自注现象	78
第五章 次韵现象	96
第六章 联章现象	116
第七章 杂体现象	145
第八章 词史现象	166
后记	183

绪 论

在宋词发展过程中，一直纠结着这样的矛盾：是归向于诗的本源，还是固守于曲的本位。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说和大晟词人、风雅词人的审音创调、讲求乐律，代表了固守本位的坚持；苏轼的“诗词同源”论和爱国词人、辛派词人的“壮怀激烈”、“以诗为词”，代表了归向本源的变革。两者互相抗衡，此消彼长，又互相影响，取长补短。结果是，一方面，两宋词坛 300 余年，婉约词、风雅词整体上应该说还是主流；另一方面，宋词的诗化现象也很突出，并且愈演愈烈，宋以后，词就完全蜕变为新体格律诗了。

从胡适开始，治词学者逐渐重视豪放词，近百年间，东坡乐府稼轩词常是热门话题。但豪放词不等于诗化词，婉约词也有诗化现象，词的诗化涉及的范围更广，而学界迄今对此研究不够。进一步探讨宋词诗化现象，对于全面认识宋词创作状况，准确把握宋词发展轨迹，乃至文体演变规律，都是必要的。

—

词是伴随着燕乐的流行而产生的，是依附于新兴曲调的音乐与文学紧密结合的艺术样式。就现存唐代民间词、文人词来看，早期词作题材相当宽泛，风格比较多样，诚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所言：“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①亦如夏承焘《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议》所云：“词之初体，出于民间，本与诗无别，文士之作，若刘禹锡、白居

^① 王重民：《敦煌曲子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6 年版，第 17 页。

易之《浪淘沙》、《杨柳枝》、《竹枝》，以及张志和、颜真卿之《渔父词》，亦近唐绝，非必以婉丽为主。”^①这个阶段的词，尚未形成本体特征，尚未完全独立于诗体之外。

但是，词由民间走上文坛，经晚唐五代，却形成了“侧艳”的传统。从创作角度看，这个阶段词所依据的乐曲大多出于乐府教坊、舞榭歌台，依声填写的作品大多是交给歌女演唱的，为适应歌伎演唱的声口、情态，文人填写的歌词内容便自然地侧重于痴男怨女的离愁别恨。从接受角度看，词是宫廷朱门帝王贵族宴饮之际的歌舞佐酒之具，而晚唐五代的统治者多耽于逸乐，溺于声色，其生活情趣和审美情趣更使应制、应歌的词作必然地充满浓郁的脂粉气。《花间集》收录 100 多年间 18 位作者的 500 首词，代表了当时词坛风尚；欧阳炯的序作为第一篇论词专文，又给予了理论化的总结。于是，依附于乐曲，内容以艳情为主，风格以婉约为宗，语言以绮丽为美，手法以比兴为长的词的范式基本确立，词已经从诗体中分离出来了。

北宋前期，统治者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召集流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并以租佃制取代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使经济很快繁荣起来，商品交换空前活跃，城市人口大大增加。我们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见当时汴京（开封）繁华的盛况。此外，苏州、杭州、扬州、成都、洛阳、广州、泉州等城市同样繁盛。市民阶层因此而进一步壮大。小市民爱好通俗文学，词、曲、戏剧、小说的兴起都与市民阶层的兴起有关。并且，城市经济的繁荣总是和歌舞风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柳永《瑞鹧鸪》写苏州：“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娥画舸，红粉朱楼。”赵彦端《鹧鸪天》小序云：“羊城天下最号都会，风轩月馆，艳姬角妓，倍于他所，人以群仙目之。”酒馆妓院，宴饮歌舞，往往伴随城市经济的繁荣而兴旺。

宋之初，循旧制，置教坊，来自各地的乐工都安排在教坊里面，长久离析的唐代教坊旧曲渐渐被整理出来，乐工还“因旧曲创新声”，曲调日益丰富。适应这些新兴曲调而填写的歌词随之涌现，斗奇争妍。词与音乐的结合是以歌伎为中介的，词的创作目的和艺术价值是通过歌伎的演唱实现的。歌伎是从事

① 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一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1 页。

音乐歌舞的艺人,我国先秦便有“女乐”,汉代也有“倡乐”,到唐代,歌伎进一步制度化。宋沿唐制,官伎活跃,家伎风行,市井伎更趋社会化、商业化,歌伎活动范围更为广泛,成为士大夫的娱乐伙伴和社交中介。歌伎与文人的共同创作,歌伎与文人的互动,是宋词得以繁衍的渊藪。

总之,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教坊新曲的流传,歌伎制度的延续,加上统治阶级的倡导,士大夫公务之余,小市民劳动之余,宴饮冶游、对酒当歌之风日盛,词在沉寂半个世纪后,迅速火热起来,而主要走的是“花间”、“尊前”的畦径。

当词在柳永手里按其本质特征发扬至极的时候,苏轼提出了“诗词同源”论,并在创作实践上“以诗为词”,大胆革新,别开风气,将宋词的演进拉到诗化的拐点。此后,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一大批作者继武其足迹奋力前行,宋词发展的诗化之路就这样走出来了。

诗化是对词体基本范式的全面改革。

首先,是打破“诗志词情”的分工,开拓题材领域。宋代文士多持文体等级观念,文第一,诗第二,词更等而下之。钱惟演曾自称:“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词)。”^①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他们在诗文中表现的是政治、经济、理想、抱负,是重要题材、重大事件,而词则“缘情而绮靡”,是用来抒发个人情感的,并主要指爱情、恋情。词的诗化,把士大夫文人相对比较宽阔的生活内容引入词中,游仙、咏史、登临、宴集、送别、悼亡、田园风光、农村景象、仕途感触、哲理探讨,等等,几乎无所不写,凡诗可以表现的题材内容,词都可以表现,到《稼轩词》,不仅“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②,更高举抗金爱国的大旗,高唱时代的最强音。及至南宋败亡,刘辰翁、汪元量等又尝试以词纪史,移植、发扬了“诗史”精神。

其次,是打破“诗庄词媚”的界限,开创豪放风格。在花间樽前,由蛾眉皓齿,唱“晓风残月”,宜其缠绵悱恻,莺娇燕昵,这是婉约词的基调。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③(胡寅《酒边集序》),豪放词由此异军突起。诗化之词,是不能

①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页。

② 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8页。

③ 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用“豪放”一言以蔽之的。《稼轩词》“大声鞺鞳，小声铿訇，横绝六合，扫空万古”^①（刘克庄《辛稼轩集序》），可谓“雄深雅健”；张元干《芦川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孝祥《于湖词》“笔酣兴健”、“骏发踔厉”^③（汤衡《张紫微雅词序》）；刘过《龙洲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④（刘熙载《艺概》）；刘辰翁《须溪词》“风格道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⑤（况周颐《蕙风词话》）等等，总之不可一概而论。但是，词的诗化，催生、形成了豪放一派，与婉约派双峰并峙，使宋词刚柔兼备，这一点毫无疑问，功不可没。至于豪放词内部之大同小异，则与婉约词若仔细分别，也是妖娆婀娜、多彩多姿一样，属于另一层面的问题。

第三，词的诗化促进了词的雅化。题材的开拓带来内容的雅化，风格的创新带来情调的雅化，内容、风格的变革又带来方法技巧、遣词造句的雅化，这是成系列的连锁反应。再加苏轼等人推尊词体的努力，使原本被人小看、轻视的词，开始登上大雅之堂。后来，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以姜夔为代表的风雅词人，他们通过规范词调格律，讲究谋篇措辞，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宋词的雅化。尤其是周邦彦一度提举大晟府，以朝廷音乐机构掌门人的身份，依靠自己出众的音乐造诣、文学才华，集婉约词之大成，影响深远。周邦彦之后，南宋词坛上婉约词就演变为格律派风雅词。就词的雅化而言，婉约与豪放两派可谓殊途同归。

词的诗化还表现在词的形式要素的诸多方面。比如，题序。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李珣《巫山一段云》注曰：“唐词多缘题。”这里的题指的是调名，缘题赋词，词意与调名一致，词作往往没有标题。后来，词所表达的内容与调名原本的含义不相关了，词牌只表示填词所依据的音乐格律，但由于内容是普泛化、类型化、通俗易懂的，所以仍旧可以无标题。词的诗化使词的内容转向自我化、个性化，具有特定的背景、指向，词的题序成为必要，发展到词用标题、小序成为惯例、常态，有些词还加自注作局部的说明。再如，议论。以议论入诗唐已有之，杜甫、韩愈就常以议论入诗。到宋代，诗中议论成为一种倾

① 施蛰存：《词集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0 页。

②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③ 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23 页。

④ 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11 页。

⑤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 5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4451 页。

向,一种风气。而宋代多诗词兼作乃至诗词并擅的文人,无论是自觉的借鉴,还是不自觉的惯性运行,他们填词之际,很自然地采用了议论这种表现手法,其佳者,议论本身精警,又与叙事、写景、抒情结合,情理交融;其下者,则生硬乏味,类同押韵的讲义。还有,次韵。当词的功能充分发掘,与诗一样成为士大夫文人唱和奉酬、交际往来的载体,大量的次韵词就层出不穷了。还有语言。敦煌民间词是口语体。晚唐五代文人词和北宋许多婉约词,因为主要是付诸歌管,诉诸听觉,所以也通俗易懂,触耳能解。而诗化词则是书语体,并且从化用唐人诗句扩大到采用经史子集的语汇入词,还大量用典使事,与宋诗的以学问、以文字为诗相差无几。总之,词逐步诗化以后,有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也有以学问为词,以议论为词,以文字为词;有诗序结合,也有词序结合;有杂体诗,也有杂体词;有联章诗,也有联章词;有次韵唱和诗,也有次韵唱和词,等等。

按照诗的要求选择题材,抒发感情,按照诗的方法采用联章次韵、小序自注,按照诗的功能诉诸视觉,置诸案头,这样的词作不求也难以演奏歌唱,于是,词的音乐性明显减弱,文学性明显增强。随着宋词诗化的进展,诗词相通、诗词趋同现象愈益突出,最终,在大多数作者手里,词背离了合乐可歌的本质特征,摆脱了声韵格律的束缚,蜕变成为一种新体诗。

二

宋词诗化的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酝酿阶段

王国维《人间词话》指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①李煜从南唐国主沦为阶下囚,面对残酷的现实,“天上人间”的巨大反差,他的后期词作直接地真实地抒发家国败亡的深哀剧痛,与其前期词作,与晚唐五代词风,明显不同。所谓“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就是一定程度的诗化。

据《全宋词》,赵宋开国半个多世纪,只有13位词家留下30余首作品,但却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潘阆10首《酒泉子》描写了杭州的风风景

① 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93页。

俗,李遵勖《滴滴金》描写了开封的升平气象,王禹偁《点绛唇》抒发了仕途坎坷的慨叹,钱惟演《木兰花》抒发了人生易老的伤感等等,沿袭晚唐五代艳词传统的作品不到三分之一。

再往后,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将军旅边防之事、卫国思乡之情引入词中,境界开阔,悲壮苍凉,是宋代豪放词的发轫之作。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写晚秋登临所见所思,怀古咏史而针砭现实,殷忧赵宋王朝重蹈覆辙,立意深远,风格凝重。欧阳修的《朝中措·平山堂》,描述凌空矗立的殿堂,若隐若现的山色,和才华横溢、气宇轩昂的太守,格调疏宕豪迈。范、王、欧都仕至将相,标高见著,他们上述仿佛边塞诗、咏史诗、写景诗一般的词作,声宏气壮,后人承流接响之多,可以想见。

柳永是婉约词的代表作家,是苏轼的对立面,但是,柳词中就已有诗化的迹象。《乐章集》里,都市题材的词有40多首,北宋的开封、扬州、苏州、杭州、长安、成都等主要名城,在柳永笔下都有生动的描写。柳永登第为官后,久困州县不得选调,长期的游宦生涯,使他写下不少羁旅行役之作,词多以风月恋情与羁旅苦况作对比,剖露欢情无着、功名又复无成的内心矛盾,也写了各地的风貌和四季的景色。都市繁华、羁旅行役是柳永在词的题材方面的两大开拓,另外,他还有咏史词和咏物词。晏几道,与其父晏殊并称“二晏”,专学唐五代小令并以此名家。但黄庭坚《小山词序》云:“晏叔原……乃独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①就是说,晏几道在句法上是以诗入词的。

以上词家的创作实践是宋词诗化的前期准备。

(二) 奠基阶段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曰:“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②吴梅《词学通论》云:“子野上结晏、欧之局,下开苏、秦之先。”^③张先在北宋词坛处承前启后之地,有创新开来之功。他享年89岁,40岁前一介布衣,40岁后步入仕途,既经常接触歌妓乐工,又广泛结交达官贵人,小市民的俗和士大夫的雅他都深刻了解,词的特点和诗的精华他都融会贯通,积淀厚重而不囿于陈说,且艺术上不

① 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②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49页。

③ 吴梅:《词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9页。

懈探索追求。宋词之有小序、自注,以词为士大夫交往应酬的载体而次韵唱和,都自张先始,都首见于张先词。张先注意写自己的“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注意表现具体的特定的人与事,因此获雅号“张三中”。张先曾写过《沁园春·寄都城赵阅道》,塑造了一个系国安危、功成身退的封疆大吏的形象,还有《宴春台慢·东都春日》和《破阵乐·钱塘》写汴京与杭州,属都市题材。张先对词的内容、形式、功能多方面的创新,集中到一点就是“诗化”,而这一点对苏轼影响很大。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任杭州通判,时致仕退休的张先正居杭州,杭州形成了一个以张先为首的词人圈。苏轼对张先十分尊敬,在《祭张子野文》中说,“我官于杭,始获拥彗”;在《和致仕张郎中春昼诗》中说,“跪履数从圯下老,逸书闲问济南生”,以从学后辈身份看待张先,对张先的人物风神和艺术风貌给予很高的评价。倅杭期间,苏轼与张先过从甚密,诗词唱和颇多。就词而言,两人曾同游西湖,同赋《江城子》;知应天府杨绘访问杭州,苏轼赋《定风波》饯行,张先赋两首《定风波》,次韵分赠杨绘和苏轼;杭州知州陈襄(字述古)离任前宴僚佐于有美堂,张先作《虞美人·述古移南郡》,苏轼作《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杨绘移知杭州,与苏轼、张先饮于流杯堂,杨绘自撰腔《泛金船》,张先与苏轼又都有同调和词。熙宁七年九月,杨绘被召入京,苏轼调知密州,两人同舟北上,张先与山阴知县陈舜俞相从送行,一起到湖州拜访知州李常,又遇刘述,遂欢聚于湖州碧澜堂,又畅饮于松江垂虹亭,这就是著名的“六客之会”,张先有3首词、苏轼有2首词记此次宴集,其中《南乡子》为两人的同调之作。熙宁七年一年时间,苏轼写词40多首,有不少与张先同调同题,许多词立题目,有小序,是唱和,并次韵,明显效仿张先的做法。

张先去世时,苏轼正任徐州知州,闻讯而作《祭张子野文》,称张先“微词宛转,盖诗之裔”。此后,又为张先的诗集作跋,称“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苏轼两次把张先的词与其诗联系起来,不是偶然的,不是无意的,它反映出苏轼对张先词诗化倾向的理解和认同。当苏轼登上词坛,面对他所不满的艳科俗词,想要改变词风,恰逢张先与之交游,受影响和启发,于是自觉选择“以诗为词”,完成了宋词发展史上更有积极意义的革新,开创了宋词的新局面。

(三) 高原阶段

苏轼以诗为词,豪放词异峰突起,词的诗化现象较快蔓延,但尚未蔚为大

观。金兵入侵,宋室南渡,靖康之难改变了国家命运,也改变了词坛面貌。诗化的路径与风格正适合于表现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抒发英雄志士的壮怀愤慨。鲟阳居士《复雅歌词》、王灼《碧鸡漫志》、吴曾《能改斋词话》、胡仔《苕溪渔隐词话》等,南宋占主导地位的词学批评是充分肯定“诗词同源”之论和“以诗为词”之法的。这样的词坛舆论又助推了宋词的诗化。南宋早期站在抗金斗争前列的将相,如李光、李纲、赵鼎、胡铨“四名臣”和岳飞,创作了最初一批爱国词,词史上并称“二张”的张元干、张孝祥接踵而起,至辛派词人群问世,词的诗化达到高潮,而巅峰则是辛弃疾的《稼轩词》。

这个阶段词的诗化,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作家多,作品多。除上述岳飞、“四名臣”、“二张”和辛弃疾外,高宗朝还有叶梦得、陈克、朱敦儒、向子諲、李弥逊、陈与义、王以宁等,孝宗、光宗朝还有陆游、陈亮、刘过、袁去华、刘仙伦、杨炎正、黄机等,可谓阵容强大。这些人大多有词集传世。岳飞虽只留下三首词,但他的一阕《满江红》“怒发冲冠”、“壮怀激烈”,教育和鼓舞了千百万人。陈与义虽仅存词 18 首,但被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称为“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吐言天拔,不作柳塘莺娇之态,亦无蔬笋气。殆于首首可传,不能以篇帙之少而废之”^②。其余各家均为丰产,向子諲《酒边集》176 首,朱敦儒《樵歌》246 首,《稼轩词》更有 626 首,数量在两宋居第一。

二是时间长,影响大。从靖康元年(1126)到辛弃疾去世(1207)、陆游去世(1210),豪放风格的爱国词风起云涌,持续 80 多年,并且占据了词坛主导地位。

三是主题集中,形式丰富。爱国主义是这个阶段诗化之词高度集中的主题。无论国破家亡之痛,颠沛流离之苦,无论同仇敌忾、抗金复土之志,请缨不果、报国无门之恨,其核心思想都是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精神。词作基调或哀伤沉郁,或高亢激昂,大都悲歌慷慨。而诗化的体现——叙述、议论、标题、小序、次韵、联章,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这阶段的代表作家当然是辛弃疾。《稼轩词》内容丰富,有爱国词、农村词、闲适词,也有艳情词,但主流无疑是爱国词。辛弃疾的爱国词或追忆军旅

① 王兆鹏、刘尊民:《宋词大辞典》,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82 页。

② 同上。

生活,或怀念中原故土,或表达收复失地、捐躯沙场之志,而特别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是作者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深愤巨痛。

辛弃疾资兼文武,身手不凡,却只是以词名世,因而胸中积聚着一股愤恨不平、狂放不羁之气,他“以气入词”,淋漓尽致地表达因朝廷苟安致使自己壮志难酬的郁闷愤懑之情。他运用散文的写法、章法、句法,纵横自如地抒情言志,高谈阔论,跨越了词与诗文之间的某种界限,进一步解放了词体,推动了词的诗化、文化。其《沁园春·灵山齐庵赋》云:“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雄深雅健四字,恰是他对自己词作的“夫子自道”。所谓雄深雅健,即雄奇刚健与深婉雅丽的水乳交融,而这是对散文风格的概括。

(四) 延续阶段

南宋后期继承苏、辛以来豪放词风和诗化倾向的作家主要有刘克庄、戴复古、陈人杰等。刘克庄为《稼轩词》作序,给予极高评价;又自称“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后村长短句》最突出的是忧国伤时、愤世嫉俗的篇什,包括中原未复、功名未立的悲慨,杨慎《词品》谓其“壮语可以立懦”^①,毛晋《后村别调跋》评它“雄力足以排冦”^②,指出了刘克庄词笔力刚健、气势豪纵的特点。刘克庄词的诗化还表现在形式方面:大量用典,议论为词,以及赓和之作特别多,如《念奴娇》六和、《沁园春》十和等等。比较阅读可以见得,刘克庄词同他的诗十分相似:对中原沦陷的耿耿于怀,对神州一统的殷殷企盼,风格上的豪情壮采,手法上的使事用典,包括深厚含蓄不足的缺憾,都几乎一样。这正是他以诗为词的必然结果。

戴复古、陈人杰均科场失意,终身布衣,却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将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词里抒写蒿目时艰,而无由戮力国事的热忱与愤慨,写作上两人都取法苏辛,但戴复古较少用典,而陈人杰所存 31 首词,全用《沁园春》调,且多小序,显见他是把词当作长短句格律诗来写的。

诗化与雅化,原本就是相互交叉、重合的,南宋由婉约词演变而来的风雅词,为雅化词作也采用了某些诗化手法,如姜夔《白石词》之小序、用典,王沂孙《花外集》的咏物、寄托等。更重要的是,姜夔也有黍离麦秀之叹、长淮金鼓之

① 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4 页。

② 同上。

鸣,王沂孙、周密、张炎等则有亡国之痛、故国之思,题材和思想远不是仅限于风花雪月了。

三

词的兴盛与变化,同国运、时局密切相关。

词的产生同国家的统一有关。公元589年,隋灭陈,结束了270年南北分裂的局面。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贯通,民族间的融合,必然带来文化上的汇流,词于是应运而生。词是南方和北方、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外国、音乐和文学的水乳交融。

宋词的繁盛,从根本上讲,也同北宋统一中国有关。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代周而起,建立了赵宋王朝,虽然国力不算强大,燕云十六州始终没有恢复,卧榻之侧也只好听任辽和西夏等强邻酣睡,但它总算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并较长时间保持了一个相对承平的局面,这是宋词繁盛总的基石。

宋词诗化的动因,归根到底也要从源头上寻找。

赵匡胤鉴于唐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教训,建立宋朝以后,采取了“强干弱枝”、“守内虚外”、“重文抑武”等一系列防止地方尾大不掉、防止武将拥兵自重的措施,并在经济领域调整生产关系,改进生产工具,使宋朝建国100多年间,基本保持社会稳定,农业显著发展,工商业逐步繁荣。但是,真宗、仁宗、英宗三朝一味奉守所谓“祖宗家法”,一切因循苟且,致使各种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趋激化,各种弊端主要是“三冗两积”,特别是财政危机日益突出,宋王朝“兵虚财匱”,难以为继。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纷纷倡言改革。早在真宗即位初,王禹偁就应诏上疏,建言五事,包括“减冗兵、并冗吏”和“亲大臣、远小人”等主张;仁宗宝元二年(1039),宋祁上疏,指出国用不足在三冗三费,建议裁减官兵,节省靡费;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上疏条陈十事,以整顿官僚机构为重点,推行“新政”;皇祐元年(1049),文彦博提出“省兵”;嘉祐六年(1061),司马光上三札,论“君德”、“御臣”、“拣军”,也是主张“省兵”和整顿吏治。^①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王安石随即建立一个主持变

^①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137页。

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参与草拟新法。后来不同意王安石变法措施的韩琦、富弼、欧阳修，曾是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的骨干，欧阳修还因此而贬知滁州。苏轼也因不赞成司马光尽废新法而外放。正如南宋陈亮所说：“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①也就是说，士大夫政见不一，那是变法方案措施的分歧，在必须革新上则基本一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熙宁变法的反对者都斥为保守派。政治经济的改革，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虽都失败，但文学领域的改革却取得了成功。王禹偁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导者，在理论上有建树，创作上有实绩，其仅存的一首词《点绛唇》，标题“感兴”，借江南雨景、“天际征鸿”，表达壮志未酬的苦闷。《词林纪事》引《词苑》对此词的评语云：“清丽可爱，岂止以诗擅名。”^②率先将词用诗化方式写作的范仲淹、王安石，是政治革新的主持者，欧阳修、苏轼则是诗文革新的领导者。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的自觉，产生了文体的观念。从刘勰开始，历代文人都高度重视文体之辨。就诗歌而言，严羽《答吴景仙书》云：“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③许学夷《诗源辨体》云：“诗，先体制而后工拙。”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魏庆之《诗人玉屑》、王楷苏《骚坛八略》、李其彭《诗体举例》等，都有诗体辨析、研究的专论、专章。我国古代文体种类多，区别界定又很严，文体的名称和基本原理是不能混淆、不能改变的。但到了宋代，在持续高涨的变革思潮的冲击下，破体为文的现象十分普遍，其中包括以诗为词。由此可见，词的诗化是北宋社会变革的产物。文学创作的源泉是生活，任何文学作品，总是一定社会现实的直接或者曲折的反映，宋词的诗化就是社会变革的具体体现。

宋词诗化高原阶段的到来，固然有作家个人观念和实践的主观因素，更有社会变化的客观条件。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剑与火、血与泪的特定时代，天地翻覆、山河易主的民族浩劫，救亡图存、艰苦卓绝的抗金斗争，促使以爱国为主题、以豪放为基调的词作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终于占据词坛主导地位，并保持了80多年之久。如同北宋诗化词的作家多为主变的革新人士一

①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② 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一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③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30页。